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统编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

数字化

鲍宗豪 / 主编

与人文

精神

Shuzihua yu Renwen Jingshen

上海三联书店

数字化 与人文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统编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

鲍宗豪 /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字化与人文精神/鲍宗豪主编. -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3. 6

ISBN 7-5426-1797-4

I. 数... II. 鲍... III. 人文科学 - 研究 IV. 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6147 号

数字化与人文精神

主 编/鲍宗豪

责任编辑/张 英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沈 鹰

责任校对/陶立新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 @ online. sh. cn

印 刷/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48 千字

印 张/18

印 数/1-5000

ISBN 7-5426-1797-4

C·40 定价 28.00 元

重视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研究

(导 言)

鲍宗豪

以数字化命名当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特征,已表明数字化时代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具有某种断裂的特征。从技术发展、社会变革和人文视域转换的角度对数字化时代进行分析与判断,是当代学术界的主要观点。然而,如果对其基础缺乏审慎的反思和批判,必然会造成思想的混乱与困乏,而要抓住数字化时代的脉搏,返回并透视数字化时代的根基,必须从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入手,才能得到真实的解答。

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考察的是“精神的现象”,或者说“现象的精神”,它排除主观与客观、主体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达到主客关系的相互贯穿与渗透,对现行与流行的各种话语、概念、术语和逻辑重新加以思考与界定,以此作为把握数字化时代发展精髓的重要方法与内容。

—

黑格尔认为,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平凡的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为现实、现世的利益而辛劳,这种物质现象在外部、而且已经渗透到内在的精神世界之中,占据了精神选择方式及其内容的主要方面,以至于精神所具有的能力、能量和手段极度萎缩,

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些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至于许多比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些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牺牲在里面。世界精神太忙于现实与现世的生活,无法回到人的内心世界,无法回到自身。因此,以现实、现世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破除和超越现实生活世界的控制,寻求能够安身立命、格物致知的新逻辑、新内涵、新方式,成为每个时代“精神现象学”考察的核心内容。

古希腊时代流行的观念认为,精神、思想反映的只是最普通、平凡的现实,也就是说,凡是正常的知觉和感受力都可体察的客观现实与精神世界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精神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关系。但是,思想家们希望走出这种精神与现象的统一,企图从现象域之外另立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绝对、恒定而和谐,是现实世界诞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该时代精神现象的把握和判断,就遵循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溯源的逻辑推理方式,对日常经验现象进行大胆怀疑。苏格拉底以巫师、教唆青年道德败坏的罪状被判处死刑,然而理性执著的精神现象学从此产生。

世界精神在地上行走,而我们却无法感知它的存在,或感知它却无法把握它。康德的四大批判直指流行的各种精神现象,以批判力来穿透这些现象,整理它们、引导它们。康德问题的落脚点是社会历史的综合判断,《历史理性批判》之前的三大批判,是他进行逻辑理论与概念范畴的清理工作,清理之后的空场是对现存世界进行整理与建构。

康德的判断力是指把个别的东西附属在普通的东西之下而去思考它的一种能力,如果只知道个别或者仅仅知道普遍都只是认知的一个方面,要做到从个别向所属普遍推理的“反思判断”,然而反思的内容和特点却因社会存在的不同领域而发生断裂,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也就是说康德的批判只是找到了实施理性逻辑的

基地与方法,尚未构建出对“时代总体”的判断力。黑格尔显然意识到康德思想的破绽,企图建立自己的一套时代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紧随康德的逻辑,进一步清理理性逻辑的基地与方法,并一以贯之地运用于自然、社会、历史与人类精神的全部领域,建构起精神现象学的完整逻辑体系。促使青年黑格尔创立精神现象学的动机,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希望通过精神现象学来寻求和表达这种精神。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可以冲破重重阻碍和束缚来到世间,尽管世界存在有诸多不满意之处,但应该相信通过辩证法的运动会返回到世界精神的境界。不复存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复存在,因为它存在的合理性不复存在,不符合自身内在结构与外界条件的要求,任何不复存在的事物必然要被比它更符合“过程合理性”的存在物所替代。黑格尔所做的工作是对理性逻辑的前提进行重新界定,自由、自然、精神、实践、道德、伦理、科学、法律、历史、国家、世界等概念术语,在精神现象学体系中都进行了黑格尔式的转换:精神把握世界的层次性、等级性表现为世界存在领域的层次性、等级性。而真正能体现他所孜孜追求的世界精神,并不能等同于狭隘的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尽管它可以通过后者体现出来。

3

黑格尔时代对自由、科学、理性的过度夸张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黑格尔将每一个原则与方法都纳入一个美丽的花环中,体现出理性逻辑强势编织和努力建构的捉襟见肘。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再次破除理性绝对精神的迷失,成为胡塞尔现象学考察的核心内容和理论出发点。

胡塞尔现象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时代的“思想史地图”,使“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深入各思想流派的核心,影响了时代精神的发育与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胡塞尔看到世界的苦难,意识到现代文明危机四伏,对过去最确定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质疑。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胡塞尔将“回到

事物本身”与现时代发展的实际境遇联系起来,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理性文明制度日益繁盛的时代,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企图将实证的、自然的物理方式与哲学、人文的心理的方式进行结合,通过建立一门严格科学——现象学,以此来澄清和批判一系列基本认识,使时代精神重新获得拯救。

回到事物本身即回到现象、事情本身,通过现象学还原法,摆脱任何理论假设的预定前提,“中止判断”是为了达到更加严格的判断。胡塞尔的悬置思维重提了笛卡尔的理性怀疑态度,通过返回现象本身使精神从自然的态度、理性扭曲的态度向无偏见、直观的态度转变。现象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层层递进,最后只剩下所谓现象学的残留物、现象学的剩余,即纯粹意识,这样现象也就成为精神现象学的代名词。现象学态度和原则要求自我及其思想态度的完全转变,企图使人类从此摆脱心灵的困顿与贫乏,走向知识论与思想追求的恒定状态。

4 胡塞尔现象学是针对时代精神危机的现实,但现象学剩余的意向性,具有意向对象的绝对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特点,意向性的能动与创造本身并不纯粹和先验,先验自我作为自我反思的绝对出发点,本身含有诸多破绽。

海德格尔重新将哲学返回存在论的世界,通过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以基本存在论来领悟时代精神的基本意义。经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德格尔,对时代精神的更加透彻与明晰。他认为对时代存在不应以“时代精神是什么”方式提问,而应返回根基处,首先询问“时代精神何以存在”,只有明确了存在本体论的根底,才不会被各种“存在者”的现象所迷惑。

海德格尔直接承袭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的研究命题,对这些命题从存在本体上加以澄清,将抽象的概念、术语、范畴重新拉回“此在在世”的语境中,在面对生死和承担自己责任的世界关联网中,通过时间性的具体展开,追问时代精神的走向。

海德格尔追问时代精神依然从精神现象的角度入手,从精神现象的本体论、精神现象本体的世界展开以及精神现象界本身三个方面来把握时代精神的总体特征。实际上对时代精神的判断与思考不能局限于精神世界,必须从其本体的根基处入手,这是确立时代精神总体境遇的核心内容,仅仅以社会、历史、政治、科学、艺术作为本体的现象展开,必然会遮蔽、甚至阻碍时代精神的总体绽出。海德格尔通过考察存在的时间性领悟、科学技术的追问、艺术的探求等构建出具有浓厚形而上学色彩的“解释学意义的精神现象学”。

以解构形而上学为己任的新现象学,拒绝学科建制的现代性束缚,批判绝对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的逻辑压制,不崇拜任何逻辑中心主义,巴特、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企图通过对异质性、差异性的强调,打破普遍结构和逻辑的决定论,呼唤出丰富色彩的新世界。目前,新现象学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日益推进愈加显示出其突出地方性选择的意义和价值。

二

马克思青年时代就对流行的各类精神现象、社会现象表现出深深的关注,然而要认识、澄清这些精神现象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层次,必须返回到芸芸众生的生活世界、劳动世界、物质世界。精神转向尘世或把精神拉向尘世,促使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挖掘传统精神世界逻辑建构的深层难题,认识到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交往相交织。从精神世界的历史与逻辑现实发展看,精神世界对物质世界的远离或者抛弃是对自己出生地的遗忘,精神现象的解释权最终必须回到被许多思想家所鄙视的“卑污的现实生活”中去。

马克思的批判思想是对精神现象的澄清,而批判的武器始终

无法代替武器的批判,经济生产与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与政治运动、科学革命与技术革新、思想解放与文化启蒙、政治解放与人类进步等,成为马克思不断推进自己思想深化的重点领域。古典政治学、古典经济学寻求抽象的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对永恒性的把握来揭示思想的超越以及精神的高贵与纯粹。而马克思精神现象学的立足点是人类现实生活的感性活动,重点分析现代化工业生产与管理、技术、组织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抽象意义、永恒的自然存在、技术存在、人文存在等,在现代工业化生存的时代境遇中荡然无存。

因此,马克思精神现象学的图景不是飘浮在天上,而是返回大地,在大地上展开,它一方面连续追问传统精神现象停滞于“精神殿堂诸神”的分析方法和内涵,实现了“真正时代的精神精华”的现实提炼与升华;另一方面,它一开始就是世界图景,遭遇到全世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攻击,没有国籍的马克思塑造出超越民族、国家的真正的精神现象学。

6

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力量,将精神放逐到彼岸世界不能证明精神的伟大,只能说明精神的困乏和无奈。立足于此岸世界寻求精神的物质力量,取消彼岸世界对此岸精神权利的压制和剥夺,是马克思穷尽一生孜孜以求的事业,也是其精神现象学思想的精髓所在。马克思晚年对时代精神现象的判断更加清晰和彻底,从人与人类社会诞生的源头处揭去现实存在的层层面纱。人类学笔记所论及的不同民族、群体的原初状态,是人类与世界关联最紧密的时代,也是最能显现人类精神诞生秘密的时期。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其实反过来意义更大,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更加重要的钥匙,从最原始的根基处揭示出人如何与世界打交道,如何构建和逐渐形成现实存在的各种秘密。这样从精神现象学的物相,到其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生产、生活等一切感性生动的关系,到最初人类诞生地

所显现出的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说明,一幅立体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现象学的图景逐渐展开。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承袭了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并将马克思的思想与流行的各种观点加以联结,形成独特的时代精神判断。列斐伏尔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理论运用于日常生活批判,认为资本使人变成人们发展的“经济人”,应该用“全面的人”来取代它。日常生活殖民的实质就是人性的殖民,必须展开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卢卡契与葛兰西倡导对资本世界进行“总体性”的批判和革命;法兰克福学派对时代精神的判断与此相类似,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等总结出的“单维社会与单维人格”、“否定性社会与否定辩证法”、“交往实践与社会进步”等观点,直指时代精神的内核,对资本控制、技术控制对个体差异的压制进行批判:劳动、需要、享受乃至思维,都被现代工业文明整体划一化了,人日趋非人化,“绝望是历史和社会所造成的最后思想”。

后现代主义以为自己把握了时代,表达了时代精神的思想核心,其实这种从西方现代文明和思想逻辑传统产生出来的思想,是伴随着现代性一并产生的。笛卡尔、帕斯卡与牛顿的理性彷徨已经昭示出绝对理性断裂的可能性,康德在询问“什么是启蒙”时,实际上已经将启蒙等同于理性。福柯、德里达、德勒兹、詹姆逊、罗蒂等在世界性整合与分化、统一与差异中挣扎,在反思现代性的出处和未来时,自觉不自觉地重提了马克思对时代精神的判定方式和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的结合是必然的。实际上,作为辩证法思想的内核,当现代主义绝对理性达到登峰造极时,对差异性的呼唤是最自然不过了。而我们刚刚经历现代性,又遭遇到后现代主义潮流,如果不能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就会失去判断和行动的方向,丧失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机遇。

三

数字化时代是以数字为中介、载体和体现方式的时代,是以纯技术化的物质形态为标志而命名的。数字化时代是数字帝国时代,数字成为交往凭证和必要工具,人与世界通过数字化而日益亲近和相互了解。互联网络、生物技术、模拟实验、思维工程和数字游戏等编织出数字化的时代场景,数字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突显出数字化日益重要的塑造机制和影响,认识数字化、理解数字化、利用数字化是数字化时代发展的基本命题。

从思想渊源及其扩展的程度看,数字化不是数学和物理学的特有范畴,它表现为从熵到人、从物质到精神的一切领域。世界之间的数字化关联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数字、物理学截取的层次上,因此单维性的网络数字化、只限于于计算机网络本身,是对世界数字化普遍现象的遮蔽。实际上,中国古代智慧就通过数字化来简化和分析变幻不定、运转不息的世界,尽管有时失之笼统和空泛,但却有效的思维方式。现代主义效率至上的核心原则,实质上就是探索形成“一与多”的协调机制,既强调有效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强调部门的协调与配合。孔德、斯宾塞的社会有机整体,墨顿、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涂尔干、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等作为现代社会理论的代表,突出社会发展部门分工与组合的相互衔接,突出“一与多”的协调。

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主概念”,它向各个领域进行渗透,甚至成为支配诸多领域的重要机制。遗传密码的数字化可以控制生命,计算机网络信息的数字程序设计和传输手段可以筛选和过滤各种信息,一切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通过规则、口令、符号等标准化的数字处理,可以塑造出一个数字控制的世界。如果把数字化当作一个完全自足的概念,既非物质亦非测量,数字就是数字,这显然明确认识到数字不可转换、不可简约的独特性,但也有可能

将数字化变成一个“不证自明”的封闭性概念。因此,必须将对数字化的考察上升到精神现象学的层次,进行系统的分析。

1. 数字化本身就是一个“技术人文”概念,是高科技与人文融合的产物,如果仅仅强调其中的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就会降低数字化变革所具有整体意义。毫无疑问,数字化是技术选择和进步的产物,但技术的选择本身就包涵了历史人文的选择因素,而且技术发展越快,人文的选择性也就越强。犁与推土机的时代,人文的选择是“不得不”,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人文性的彰显并不突出;在数字化时代,人文的决定和选择性日益鲜明,更多的图式、途径拓展我们的选择空间,以至于可以说,数字化时代是愈加承受个体与群体选择的时代,如果仅仅从数字化技术角度强制性地进行的角色承担和社会选择,仍然是单维的发展之途,不利于数字人文内涵的丰富与拓展。

2. 各种数字化现象是精神现象学得以存在和展开的社会基础。数字与数字的直接接触提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效率,人类与人类社会通过“数字化杠杆”来实现和完成各项任务。虚拟交往、远程交往、穿越职业和社交情境的在线交往,弥合了时空之间的距离,缓解了真实世界的“逼迫效应”。尽管数字社会对于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冲击还刚刚开始,但其中所蕴含的极大的潜在效应却不能忽视,物理意义直接让位于数字时空、数字符号意义,新的社会实在径直撑起新的时代精神状态。

3. 当地理、物理和后天人为的制度身份、职业属性的严格性被数字化所削弱时,数字化时代的精神构成和面貌必将发生改变,由地域性支配或具有地域性极强的各种概念、术语、范畴发生彻底的裂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在数字化时代已经终结了,数字化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新纪元,一切思想史、文明史、政治史、社会史都作为“史前史”被数字化所重新书写。福山在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上论证历史的终结,认为当资本成为一维逻辑后,原有的意识

形态斗争的历史必将终结;实质上,数字化比资本更具有强大的魔力,如同上帝之手将人类推向一个新世界,自由、平等、民族、国家、道德、法律、制度、舆论等等范畴将获得重新解释,世界精神的转型刚刚开始。

4. 无论布热津斯基意义上的“地球城”,抑或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地球村”,都将数字化与全球化贯穿起来,全球性城市与村落由于数字化而变得界线模糊,人类最终的生存场景绝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虚拟都市与村落塑造出数字化时代的新公民,他无国籍、到处流动,将世界性事件作为他的事件,世界空间是他的生命之所。此时社会各种组织、机构的形式与功能,及其与个人的关系发生裂变,数字化的相互接通促使人类不断向“大同世界”迈进。

5. 数字化形成一种独有的语言文化符号和社会运行机制,使完全立足于“实在社会”的精神世界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世界精神是虚妄的,因为它的诞生地是有限的国家、民族,是具有经济价值与文化传统的地块,它以一种民族语言来述说精神的种种图景。而在数字化时代,地块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越来越被全球化视角所替代,减少了对有形空间和特定文化、语言符号的依赖。数字化时代的希腊精神、中国精神、美国精神、法国精神以及各种宗教、民族精神,不再以有形的物理、地理因素来描述,而是具有共享与分有的双重性质。数字化的时代精神在奥尔匹斯山顶上嬉戏,但彼此间又相映成趣;共同的数字之途塑造出的不是千孔一面的精神贫乏,而是充满多重互动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

6. 精神现象学是分析和彰显时代精神的学问,如果不能紧扣数字化时代发展的脉搏,整个精神现象学的大厦就会倾斜和倒塌。时代精神应该体现在公共生活的价值评判、社会发展的整体评判和个体价值实现三个方面,归根到底是既立足于实际大地,又透视大地的景象变化,而时代精神的第一缕光线则是政治生活。经济

物质生活、文化精神生活的凸现,尽管弱化了强政治的控制功能,但物质与精神的抽象凝结和具体实现,都必须经过政治这一中介环节。汉娜·阿伦特、斯密特与斯特劳斯等都将政治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将政治精神作为渗透到劳动世界、法律世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进行考察。数字化时代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人民授权不再作为预设的政治前提,而是政治实施的现实内容,数字化构造出灵通的社会,使人民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教化的真实面目,不再局限于单维的信息报道,广泛的共同参与和朴实的日常活动相结合,使公共生活更普遍地理解和认同。

因此,为了理解数字化、生命和社会,我们需要多维度的、递进的、反馈的视角,既破除数字化至高无上对现实的诸多屏蔽,又打破将数字化仅仅限制于技术层次的狭隘性,将数字化时代的精神现象学看作是既继承物质世界又超越物质世界的技术选择的产物,将精神世界的选择空间进一步扩充,使数字化具有更加普遍的价值。构成数字化时代精神现象学的现实和各种理论、神话、幻觉和梦想相互交织,将会导致出人意料的“精神突变”,一种文化引入另一种文化观念会引起连锁反应,进而改变精神世界的生成机制与存在方式,时代的想像力和观念的丰富性在数字化时代的汇聚,创造出一个亦真亦幻的新奇世界。

11

必须指出的是,数字化也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片断而已,人类精神和创造力的无限性绝不会就此止步。数字化本身的发展还存在着限度的问题:(1)比特的测量与传输只能是静态的,将所有知识、技能、规则、标准、程度的个性特征加以抹煞,统一的测量与转化是一种提升,同时也是一种对原始意义的背离,比特不可能测试出组织的功效、文化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它揭示出的只是事件——关系——信息的一个新维度而已;(2)数字化所简化的真理性及其所模拟出的景象,无论如何不能替代原件的复杂性,原件的自然性一定是超比特的。物理对象、心理对象、生命现象的

数字化是对问题系列的简化,基因图谱的绘制也只能是对生命的简化,真正的生命和自然无论如何不可能通过复制加以连续;(3)数字化生成机制的连续循环逻辑,将一切转化为控制程序所设定的信息,而程序本身的意义与价值却被忽视,原有世界的复杂意义被程序过滤得井井有条,而复杂性问题本身却日益被遗忘;(4)数字化理论和实践、具有人性味的编码与技术性的程序,二者之间的冲突与悖论现象始终存在,全息生命、全息世界并没有实现修辞学上意义上的完美融合。

四

本书是关于“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理论探讨的最新成果,它囊括了数字化与社会、数字化与生存实践、数字化与政治、数字化与语言文化、数字化与教育、数字化与人文素质等各个领域,是考察当代数字化最新进展的一面镜子,凸显出数字化研究中的六大转向:

1. 数字化本身意义的研究转向。数字化的应用如同现代的衣服适合于人类所有人,正因为如此,这种笼统的面向突出不了领域分殊和个体分殊的性质,造成社会与个人发展的程式化,许多组织与个人使用彼此相同或相似的框架模块,共享与分有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数字化本身的意义已经从过于笼统、抽象的讨论向具体的数字化社会领域的研究发展。

2. 数字化生存观念与生存结构研究的转向。数字化不再成为远离于我们生存的外在技术形态,它本身构成我们的生存方式与实践方式。数字化生存以虚拟的时空结构、组织方式、交往方式加以展开,从社会存在论的角度将数字化融入时代发展、社会建构、人文塑造的内容;数字化生存与实践作为人类新的生存方式与实践方式重塑人类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时空扩展与时空压缩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展开数字化生存视域与实在社会视域之间的

融合。

3. 数字化人文精神与数字人文研究的转向。数字化人文精神不仅仅归属于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精神,还直接将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直接贯穿起来,数字人文思想的提出体现出许多学者对高技术与高人文相互融合发展的企盼,设想走一条技术逻辑与人文逻辑相协调发展的数字化之途,消除数字化本身的技术鸿沟、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的鸿沟以及数字化的精神本身内在的鸿沟,技术贫困与精神贫困不再分立,而成为一个彼此相关的社会精神现象。

4. 数字化自我根基的研究转向。数字化直接指向作为个体的自我生成与发展,尽管“自我”带有一些形而上学的成份,但每个人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却始终是个体融入社会的基本机制。数字化转向自我根基的研究,传统文化资源的道德自律、文化自省和技术复制的自我、教育领域中的自我教化等命题,都被鲜明地提炼出来。认清楚数字化自我的生成机制、特点,是把握数字化时代精神现状的重要内容。

5. 数字化逻辑研究的转向。数字化逻辑包括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两部分,理论逻辑着重于从思想上反思、考辨传统概念、术语在数字化语境下的各种挑战,属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现实逻辑则着重从现实的实现方式、受众范围等入手,考察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属于“实践理性批判”的范畴;许多学者试图将二者进行联结,强调数字化理论发展先导、试验作用以及与现实运动的一致性,崇尚“判断力批判”的整合与衔接。然而,一些学者意识到这种衔接并非是“第三条道路”,它本身就是理论推演的产物,而实际的情况却是数字化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冲突,网络文化、全球文明的自由与共享的理论内涵,始终无法解决现实数字化贫困、殖民、地方性知识萎缩的现状。

6. 数字化人文精神建构研究的转向。探索数字化与人文精神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的分析,还必须提出行之有效的建构方案,

包括人文素质教育、学习型社会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数字化人文精神不再停留于抽象的理论训导与灌输,而是与个人成长、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加强人文精神的底座建构与人文素质的系统培养是数字化人文精神建构的主要任务。

本书所凸显出的六大转向仅仅是转向而已,它带来的不是答案,而是更多的问题。怀特海曾预言“数字化的理解问题在未来将占统治地位”,表明了数字化的研究前景极其广阔,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网络政治的现实转化、数字自我的真实性、数字化与社会化以及数字化与人文精神的研究课题必将持续下去。数字化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我们也将改变数字化本身。